

【机翻搬运】采访Layla AbdelRahim关于无政府原始主义，红色无政府主义和素食主义



sapientiae

3 人赞同了该文章 >

作者：蕾拉·阿卜杜勒·拉希姆

我们联系了Layla AbdelRahim，让她回答我们的问题。蕾拉心甘情愿地回答了，她的回答真的很全面。

蕾拉·阿卜杜勒·拉希姆是谁？ 来自维基百科：*Layla AbdelRahim*是加拿大比较主义人类学家和作家，其关于文明和荒野叙事的著作为文学和文化研究，动物研究，哲学，社会学，无政府原始思想+，认识论以及对文明和教育的批判等领域做出了贡献。她将生物系统多样性的崩溃和环境退化归因于单一文化主义和文明本体论，后者从人类中心主义+的功利主义功能来解释存在。

她的著作《儿童文学、驯化和社会基础：文明与荒野的叙事》(Routledge 2013) 和《野孩子——驯化的梦想：文明与教育的诞生》[4] (Fernwood 2013) 为儿童文学理论做出了贡献，并批判了教育，认为教育植根于将儿童驯化作为资源的文明需求。

AbdelRahim在布林莫尔学院+获得A.B，并在蒙特利尔大学比较文学系获得博士学位。她的论文题为“混沌的秩序+和文学渲染：作为知识，文化和社会基础的儿童文学”，研究了本体论+前提对人类自我知识（人类学）的影响，以及这种知识对世界生命系统和多样性的人为破坏的影响。

关于蕾拉·阿卜杜勒·拉希姆的更多信息：layla.miltsov.org。

问：你是怎么接触到无政府原始主义的？

答：我对其他生物的道德立场是在我说话之前就已经形成的。我出生在莫斯科。我的俄罗斯祖父母在莫斯科地区南部有一个小农场。看到他们如何爱他们“饲养”的动物和环绕着这个小村庄的森林，使我意识到声称爱一个人，然后冷血地杀死那个非人类作为食物之间的内在矛盾。因此，我在四岁时就下定决心，不去吃别人的肉。

我的祖父母和父母与动物，荒野，政府和技术的关系很复杂，他们允许我探索和制定自己的立场，即使在影响我成长过程中的经历。例如，我的父亲是一位热爱荒野的苏丹地质学家。我对家人最幸福的回忆要么回到俄罗斯村庄，要么回到达尔富尔+的一个地质营地，当时在地质学家发现铀矿和其他“自然资源”之前，萨凡纳+仍然繁荣昌盛。我记得我父亲批评政治和殖民掠夺性制度，认为这些“资源”的发现将重新点燃，但即使作为一个没有人类学或政治词汇的孩子，我仍然知道这种批评

仅限于"欧洲殖民主义"与"苏丹民族独立"，生活在该地区的野生动物和人类部落的痛苦受到文明冲突的影响，在这个叙述中仍然没有得到承认。然而，我全心全意地知道，我在苏丹长大时目睹的地质与采矿、对文明的侵蚀和生命的破坏之间的联系，对于理解和克服我在个人和社会层面上成长的暴力至关重要。不到二十年后，我回到了达尔富尔地区，196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在荒野中和谐漫步的生活已经从Hofrat al Nihas地区消失了。只剩下沙子、辐射、战争和死亡。

我开始阐明技术、"知识"和文明之间的这种联系，这是我在土木工程研究的第三年时，地球上生命遭受破坏问题的核心。设想道路和工程大坝的任务向我揭示了人类中心主义建筑的概念是如何成为荒漠化的根源，我看到从非洲北部爬来，吞噬了数公里的脆弱的和谐生活，幸存下来的殖民主义。战争、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物种灭绝显然是有联系的，但当时我还没有提出我的批评。然而，在完成第三年后不久，我放弃了这些研究，而是加入了帮助战争受害者和阻止荒漠化，战争和灭绝的努力。这使我进入了战争新闻业，后来又开始学习人类学、社会学和比较文学，包括我的真实生活经历，童年时接触过五种语言和历史叙述，以及指导我对当前认识论体系、社会经济和环境范式和实践的批判的伦理立场。

问：你认为AP是真实的吗？最常见的答案是，AP是乌托邦，或者没有回头路，而且我们有那么多令人难以置信的（纳米）技术，这些技术将解决我们未来的所有问题，不仅是环境问题，还有社会问题。

答：无政府原始主义是对等级制和寄生性政治和社会环境经济体系的理论和批判。这些论点是基于对生命如何在这个世界上产生并繁荣了数十亿年的观察。无政府原始主义的批判是不同的，没有单一的知识体系+或"党的路线"：例如，有些人借鉴狩猎采集者+，有些人借鉴列夫·托尔斯泰或雅克·埃卢尔的基督教无政府主义，还有一些人借鉴素食主义者的聚会传统。因为这些文明的思想家或批评家对观察生命原理感兴趣，他们从古生物学，动物行为学，人类学，生物学等各种学科中汲取灵感。人们不需要成为一个无政府的原始主义者，就可以观察到允许生命系统蓬勃发展的原则是基于多样性和野生关系的。我所说的"野生"是指"未驯化"，并且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存在，无论它们是通过神圣的干预还是地质事故而存在的，而不是为了在"食物链"中剥削的目的而存在。这些生命体系在可行的关系中茁壮成长，其中多样性是关键。无政府原始主义+批判将这些对生命原则的观察与文明和等级社会环境和经济体系的原则进行了比较。这种比较表明，单一文化主义和驯化不是可行的系统。我在作品中深入讨论了这些机制，特别是人类儿童的驯化如何遵循与非人类相同的简化，死亡威胁，单一文化主义和生活消费的原则。你可能有兴趣阅读我的戏剧，在那里我探索了本体论，神学和人类学之间的联系，名为Red Delicious（可在我的网站上找到，并在"在活着的土地上"网站上作为电子书"在活着的土地上"）。

也就是说，技术的本体论基础是"资源"的消耗，奴隶制成为这些寄生关系的基础，其中生命，力量和努力以单向的能量流被消耗。基本上，这建立了依赖关系，其中奴隶主依赖"资源"，无论是人类动物，非人类还是机器，为"主人"的利益而劳动，并且"资源"被迫交换她的生命和野生目的，以获

得生活和工作的权利。我的书《野孩子——驯化的梦想：文明与教育的诞生》(Fernwood, 2013)深入研究了驯化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

因为，正如我在书中所说，文明的前提是消费、杀戮和殖民，它产生了一种植根于捕食的人类学：杀戮和强奸。也就是说，文明知识将人类构建为最终的捕食者，世界存在于一个“自然的”等级“食物链”中，可以被控制，繁殖和消费。同样，对生命原则的观察表明，等级制的生存系统是寄生的和不可持续的，因为为了茁壮成长，生命需要多样性，相互性和共生性。通过构建一种植根于劳动、肉体和生命消费的人类学，文明因此产生了不可行的社会环境关系文化，因此我们正在目睹世界的人为死亡，而这个世界实际上正在被文明的人类动物吞噬。这是一个紧急情况，我们没有奢侈的时间来反思我们是否可以“回去”，或者只是试图挽救我们垂死的骨头。

因此，我们面临的真正问题不是观察到的未驯化的人类和非人类的社会是否是乌托邦的-不是野生的是否是乌托邦的，因为荒野已经成功地蓬勃发展，直到现在，我一直在俄罗斯和苏丹的荒野中生活。真正的问题是，文明已被证明是“乌托邦”的。因为，它从未兑现其承诺：它提高了单一文化主义的生育能力，因此今天驯化的非人类动物和人类动物占地球上椎骨生物量的98%，而在一万年前新月沃地+农业文明出现之前，99%的椎骨生物量由野生物种组成。它通过荒漠化、战争、等级制度（缺乏）获得食物和水等方式造成疾病和早期死亡。它已经殖民了世界并摧毁了它（我在我的书中引用了这些数字的研究和数据）。甚至海洋也正在变成沙漠，窒息着塑料，酸和文明垃圾。

因此，希望技术能把我们从这个垂死的地狱中解救出来，这类似于——尽管比我在东欧经常听到的笑话更痛苦、更悲惨：你用伏特加来治愈宿醉。我们都应该知道伏特加是如何治愈的，就像其他合法和非法药物一样，它本身就是绝望的症状，对技术掠夺的依赖使我们陷入绝望。醉酒的需要是我们没有能力或不愿意面对我们的真理：我们选择了文明，因此我们选择了死亡。现在真正的问题是：我们能否鼓起勇气做出不同的选择？无政府原始主义没有提供解决方案，但它的批评向我们展示了我们失败的地方，并指出了我们可以走的路有多种方式，以及我们如何治愈自己和我们的世界。

问：在社会方面和意识方面，驯化从我们身上拿走了什么？有了意识，我的意思是知识。驯化对人类发展有重大影响吗？例如。很明显，被驯化的非人类动物的发展被停止了吗？

答：驯化无疑夺走了我们关于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智慧和知识。教育教会我们如何在文明中生存：即如何依赖专家的等级制度，这些专家剥夺了我们对自己和世界的认识。我们不是通过同理心和临场感来了解这个世界——“成为你是什么感觉？”——而是被教导如何应用模式和表征来理解那些在“人力资源”食物链中处于较高层次的人希望我们“知道”什么。此外，通过学习如何将这些模式和公式应用于现实生活中的情况，而不了解利害关系的复杂性，我们失去了享受对世界更全面的理解以及对新事件的适应的机会。

在野外，人类和非人类的孩子学习如何评估每种情况并正确理解每一次相遇，因为他们知道生活和决定是相互关联的，它们并不总是可预测的。如果我们不准备感到惊讶，我们可能会灭亡。同时，这并不总是一种可怕的经历。正如克鲁泡特金+在他的《互助：进化的因素》中所观察到的那样，

生活在野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很好的经历，捕食是其不那么突出的方面，因为食草动物在历史上的数量超过了捕食者，而捕食者又吃得更少，睡得更多。相比之下，驯化的目的是确保对“资产”和“资源”的控制和预测。因此，它的纲领与进化、多样性、[即兴创作+](#)、变化和惊喜背道而驰。这种系统产生的“资源”取决于控制他们生活和食物的人。因此，依赖的“资源”无法在胁迫和威胁制度之外蓬勃发展。他们必须被愚弄，因此被骗了。他们被误导、伤害、威胁和消费。尽管如此，正如我在书中指出的那样，人类和非人类动物都渴望野性，与驯化它们被遗忘所需的几十年相比，它们需要的野性要少得多。

问：美联社+对教育的批评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不可理解的，特别是对于“现代”世界的运作。你会（在介绍时）对这些人说些什么？

答：即使对我自己来说，教育与驯化之间的联系也不是很明显的。事实上，我关于教育的书是我对战争、瑞典医学人类学研究的副作用，也是我对法国法庭上“他者性”的建构、法律和医疗机构之间联系的副作用——所有这些都促使我写了一篇关于认识论、本体论和人类学对文明和荒野叙事的理解的博士论文。当我批评文明知识的基础是基于物种的分类和分离时，这种联系变得清晰起来。也就是说，我意识到，强调将人类与非人类分开或将生命与非生命分开的差异，构成了为残酷辩护的认识论，这是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的根源。将这种社会建构的关于我们人类作为掠夺性和外星人的理解与非文明的人类和非人类与世界的关系进行比较，使我看到教育项目对驯化至关重要，因为它既提供了为压迫辩护的“知识”，人类掠夺者对生命系统的殖民主义，剥削和消费，也建立了复制这种生存文化和社会经济的方法。

換句話說，如果你想讓人們為你殺人，你需要證明他們不知道他們殺人的人的經驗和真相。他们需要与他们杀死的人疏远，这种疏远和掠夺必须归化：你构建了一种人类学，认为人类优于非人类，“劣等”人类是非本能的生物，他们不会感到痛苦，他们是为了你的消费而存在的。或者，你构建了一个你被派去杀死的人的身份，就像你的群体的敌人一样不同，合理化他们要求它，并灌输一种恐惧，如果你不先这样做，他们会杀了你，等等。但是认识论本身是不够的，你需要创造一个不断缺乏和濒临灭绝的局面，以便人们内化恐惧和暴力。这就是文明教学方法论发挥关键作用的地方：人类儿童在很小的时候就与父母分离，被关在教室围墙内的同年龄组，如果他们不学习抽象的“知识”和等级和服从的文明语法，他们就会不断受到低年级和未来失业的威胁。这种教学法反映了对非人类动物奴隶使用的方法：只有当一匹马给驯养者带来的利润超过维持她的利润时，它才会被喂养，如果她拒绝工作，她就会被杀死。从这个意义上说，著名的俄罗斯生理学家[伊万·巴甫洛夫+](#) (Ivan Pavlov) 在阐述他的狗训练理论时并没有发现任何新的东西。在我关于教育的书中，我探讨了“未受教育”儿童的其他教学法，并叙述了我对他们如何学习的观察。

问：您如何看待传统或红色无政府主义者？特别是，当我们谈论他们对技术，驯化以及通常对殖民主义的中立态度时。（其实他们对AP的态度及其思想与大社会的态度是一样的）

首先，“传统”一词非常成问题，因为它确立了对特定观点作为“多数”“规范”的偏见，从而使赋予其权力的观点正常化，同时边缘化或确立为“越轨”或“不正常”的其他观点，从而剥夺了其追随者的权力。这样一个术语提出的问题是：传统根据谁？基于互助和[共生社会](#)+经济生存文化的非文明、非技术、非资本主义社会一直是整个世界历史的规范，直到现在。未接触的人类部落继续存在，并抵抗世界各地的文明，直到今天。野生非人类也是如此。即使是那些被文明包围的人也不会轻易放弃他们陆地基地的荒野，因此巴西兴古土著人民对[蒙特贝洛](#)+大坝的抵制或加拿大米克马克对页岩气钻探的抵抗只是当代抵抗文明暴力的一些例子。事实上，自从农业久坐文化开始殖民采集者、游牧的非人类和人类动物以来，驯化和文明——以及它们的治理体系——一直受到抵制。換句話說，對各種形式的文明的抵抗已經成為全世界一萬多年的傳統做法，而“紅色無政府主義”只在歐洲歷史飛地和其他西方民族國家零星存在了幾個世紀。

其次，无政府主义的概念本身是有背景的。野生社会的生存文化基于共生的社会 - 环境关系，不能被定义为“无政府主义者”，因为无政府主义是对等级文化中的政府制度及其统治制度强加的胁迫，剥削和消费方法的抵抗。换句话说，无政府主义对于理解治理问题，阐明对驯化的批判，以及抵抗和克服基于痛苦，荒漠化和死亡的生存体系的战术目的非常重要。这些批评是在特定情况下产生的，因此是上下文相关的，因此往往是有限和有偏见的。例如，一个富有的白人男性在19世纪或20世纪的白人至上主义社会中撰写无政府主义理论并设计无政府主义实践，最终取决于“帝国主义”，种族主义者，性别歧视者和物种主义者的“特权”，这些特权使他免于体验人类或非人类“猎物”的现实。这就是为什么，即使他的分析可能有很大的价值，但他的理解和建议将是有偏见和有限的，因为他并不总是意识到每天，每分钟成为猎物是什么感觉，因为从认识论和经验上讲，他通过掠夺性的镜头了解世界。通常，这些人批评的科学源于这种自然化的掠夺性观点，他们从中受益，他们的[认识论](#)+向他们证实了掠夺的“自然”方面，从而掩盖了他们自己的存在，生存和抵抗的方式取决于在他们的社会经济生态中被指定为“猎物”的整个群体的受害者。

[贾里德·戴蒙德](#) (Jared Diamond) 的作品很好地说明了当今对文明的这种短视，该作品继续建立在非文明和未驯化世界基于暴力和掠夺的假设之上。在左翼无政府主义中，这种掠夺性的观点可以在大卫·格雷伯 (David Graeber) 等当代理论家得出的结论中追溯。例如，2009年6月，格雷伯和我在开放人类学合作社的无政府主义人类学小组中进行了一次公开讨论，他全面指责无政府原始主义者住在他们母亲的地下室里，并告诉我他知道孟加拉国农民想要什么：种植粮食。首先，用“母亲的地下室”作为侮辱来驳斥一种理论，依赖于父权制对女性的剥削和堕落。这意味着，在格雷伯的眼中，“男性化”的无政府主义者利用掠夺性制度在世界上提升自己，而不依赖“母亲”——或者为繁殖和繁殖人力资源而构建的女性阶级——是成功的秘诀。而女性阶级被贬低并保留在经济成功的背景下 - 甚至可以在这种用法中被视为“失败”。其次，这需要能够摆脱对话者的论点，在这种情况下，格雷伯对无政府原始主义者的实际论点充耳不闻，并将它们扫到地毯下，因为他将它们与“失败者”阶级联系起来 - 女性，母亲。最后，为了保持父权制（再）生产资源的父权制，白人男性统治阶级需要“孟加拉国人”和其他农民和工人留在他们的生态位，并继续希望种植食物，并为父权制前线的“知识分子”生产资源和技术。“你怎么知道孟加拉国农民不想成为无政府主义人类学家？”我问格雷伯。但格雷伯被我的回答冒犯了，因为正如他后来出于某种原因向我解释的那样，

他并不期望我"这样": 显然, 我被期望同意他的专业知识, 而不是对左翼知识分子对孟加拉国和其他农民存在的理由的合理化表示异议, 马来西亚汽车工业工人。中国计算机厂工人等, 以及无限期。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大多数白人认为是"无政府主义理论"中存在种族和性别等级制度。因为, 通常 是少数, 即白人男性, 通常来自统治阶级, 他们拥有基础设施和社会, 象征和物质资本, 使他们能够思考和生产, 以及作为主导声音进入公共领域+。白人女性和下层白人阶级必须比白人男性更努力地进入这个势力范围和社会权力。有色人种和非人类荒野的观点被赶出了占主导地位的"公共"领域。有色人种大多在出版和媒体机构中被压制, 除非他们响应白人至上主义的需求, 或者在殖民依赖"欧洲" (西方或北方) 大都市及其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寄生关系的国家成为革命者。在这方面, 即使是"革命的"有色人种也被韦塞特恩的"激进分子", 特别是左翼无政府主义者, 用作他们自己议程的道具, 旨在将白人左翼分子置于政治的先锋队, 而不会威胁到他们的种族化和性别特权, 包括获得"技术", 即活着的和非活着的奴隶和劳动力。由于这种对奴隶劳动的内在依赖, 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在与人类和非人类动物的接触以及他们使用技术和媒体时依赖于相同的模式。然而, 由于世界上大多数人 (其中70%以上是有色人种) 构成了白人至上主义的劳动力资源, 因此大多数非白人观点倾向于批评继续剥削他们的"西方"社会经济模式+, 因此对这些话语中对技术的批评更加明显。然而, 这些观点被限制在影响范围之外, 使媒体和出版业专注于"白人"人类中心知识的生产, 并将非白人观点视为先验的+无关紧要, 微不足道, 边缘和琐碎。

我与激进派、无政府主义者、主流出版界和媒体有很多接触, 证实了这一点。这里有一个例子来说明它是如何运作的: 在2007年蒙特利尔的无政府主义书展上, 我联系了纽约的Autonomedia出版社。当我向出版社的合作伙伴解释我的工作, 并提出如果他们的出版出版社有兴趣看看我的手稿, 我很乐意把它寄给她时, 她居高临下地告诉我, 我应该首先了解他们的文学作品。"我们出版无政府主义书籍。您应该首先了解我们的工作。我们不出版墨西哥食谱, "她告诉我。

Autonomedia已经出版了几位以伊斯兰名字命名的白人男性, 例如被称为Hakim Bey的Peter Lamborn Wilson和Michael Muhammad Knight, 因为这种象征性的行为 - 由白人男性取阿拉伯名字 - 似乎是激进的。然而, 当与一位棕色女人面对面见面时, 出版商无法理解我对我的作品的解释。在Autonomedia的案例中, 出版商采用了一个棕色女人与"厨师"地位较低的职业相关的模式, 并本能地认为我没有能力提出值得她的出版社关注的批评。然而, 这种与墨西哥美食的联系不仅是性别歧视;这也是种族主义的, 因为就我而言, 即使我的姓氏是阿拉伯语, 棕色的皮肤和娇小的身材也让她不必费心去弄清楚"正确"的刻板印象, 而是将我的职业概括为微不足道的, 而不管地理准确性如何。我们看到, 这位白人女性的运作方式与大卫·格雷伯+ (David Graeber) 在上面的例子中所采用的模式相同, 这个公式被用来贬低和驳斥喂养男性 (尤其是白人男性) 的厨房和白人至上主义范式, 无论这些参与其中的人是激进的还是主流的。因此, 理论的产生和对谁"知道"和谁"值得信赖"的期望是一种社会资本, 可以作为对等级制度中"传统"声音的投资, 从而排除那些实际养活世界的人的大多数观点;毕竟, 大多数人不是来自统治阶级, 他们相当"被统治", 他们在厨房

或田野里的生活被消耗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如果可以选择，他们不想让世界保持现状，并保持他们的"职业"不变。

由于"社会无政府主义者"或"红色无政府主义者"发现自己在食物链的上游，因此他们很容易对白人至上主义制度为他们的利益而工作的事实视而不见，技术对他们来说很重要，以保持他们的掠夺性"特权"完好无损，因为技术允许他们依靠他人生活。主要是非人类和有色人种：谁做采矿，钻探，农业，缝纫，烹饪，清洁，技术生产，能源，无限的永恒问题。

此外，这种等级制度本身就是一种成功的压迫机制，在所谓的"后殖民"空间中也起作用，在那里，对"前"殖民地处于权力地位的有色人种知道，如果他们继续提供白人至上主义经济模式，他们自己在食物链中的掠夺性地位就会得到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说，食物链等级制度也串通一气，使非白人和非人类观点的无政府主义声音保持沉默和边缘化，包括在他们自己的"后"殖民土地上。此外，即使对于欧洲人来说，理解无政府主义思想和传统也取决于地区，时代以及那些"领导"抵抗运动的人所表达的突出的斗争，这并不总是代表人民如何看待他们的斗争。俄国革命期间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这两个词很能说明问题：布尔什维克这个词的意思是1903年党代会中从[孟什维克](#)（指少数派）中分裂出来的多数派声音，但实际上，这是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派别占上风的更大革命规模中的少数派意见。因此，参与任何想法都需要我们对个人作品及其引发的对话保持敏感，在一种狂野的、非传统的参与中，包括解释、理解和行动。同样，在我关于教育的书中，我深入讨论了我们如何从无政府主义的角度来了解，理解和互动。

由于我复杂的背景，在一系列社会经济阶层中的各种经历，接触过广泛的历史叙述，革命，后殖民斗争以及生活在五大洲，我对指导我们理解和实践的观点非常敏感。在我自己的理论探索中，我愿意与广泛的思想家和科学家进行对话。因此，我并不回避引用白人男性思想家，如Errico Malatesta，Petr Kropotkin或Karl Marx等。但我确保我也包括来自全世界的土著，ELF，ALF或作家，思想家和革命者，并倾听非人类的非语言体验。

然而，我的背景并不是在他人的经历中获得觉悟的可能性的先决条件。[列夫·托尔斯泰](#)在这个意义上堪称楷模，因为他有能力完全同情他所描绘的人物，以至于他可以知道一匹老马如何受苦，或者一个被父权制社会排斥的女人会发现不可能继续生活下去。托尔斯泰诚实地写下了《一匹老马》或《安娜·卡列尼娜》的故事，他找不到任何文明、技术社会以及奴隶制文化的理由。这些知识对他的生活、行为和人际关系产生了可怕的影响。这样的人在整个文明史上都存在。然而，要想实现真正的变革，我们需要更多来自"特权"阶层的人拒绝他们的特权，加入他们所掠夺的人类和非人类的行列。他们需要明白，被迫作为机器存在，作为一个任性的驯化者的假肢，最终的捕食者-那个愚蠢的猿类，他把世界带到了灭绝的边缘。因为，正如[菲利普·迪克](#)（Philip Dick）在《机器人梦见电羊》（Do Android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一书中告诉我们的那样，当你意识到你可能手掌上抱着最后一只小蜘蛛，你用全身和灵魂为它哭泣时，并不是"红色无政府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团结会使那只蜘蛛复活，但是，这是一种英雄行为，它跨越了物种主义的边界，超越了本体论机器——那个终极奴隶——的边界，我们可以重新获得失去的天堂，这是荒野，这是生命。

问：在你的网站上，我读到了一个讨论，从中我得出的结论是你是素食主义者？是真的吗？如果你是素食主义者，你认为素食主义的好处是什么？你知道吗，很多人会问AP与素食主义有什么关系；人们必须回去打猎。

答：从素食主义的角度批评捕食的问题在于，这种批判会强调消费中的个人偏好，而不是突出我们如何构建人类学的更大影响。我在“神话捕食者”讨论中的开场白所表达的正是这种担忧：也就是说，我们是否应该继续根据我们的“消费”和“偏好”来定义自己，这就把争论留在了捕食领域，或者我们是否应该根据我们作为共生节俭采集者的环境角色来修改我们的人类学与其他灵长类动物一起。因此，尽管在我个人的食物选择中，我在四岁时就决定不食用他人的肉，并且在北美更容易澄清我在素食主义方面的食物局限性，但我仍然在认识论建构方面表达了我的批判，因为人类是进化的“成功”，因为他们的掠夺性人类学。同样，我在关于教育的书中更深入地讨论了这一点，我在我目前的书籍项目中投入了很大一部分，旨在批评文明进化论。最后，我在10月8日在Kwantlen理工大学B.C.犯罪学系的问答环节中谈到了这一点，可以在这里访问：youtu.be/uVQujVAN6zM。

编辑于 2022-01-08 01:05

[主义](#)

写下你的评论...



还没有评论，发表第一个评论吧